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寫畢於燕北園

第一章

徐無鬼《一個隱者的殘稿》

帶着血蒸氣的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為我的精神兄長而寫

在〈民間思想的堅守〉一文裏，我談到自己不過是「學院裏的精神流浪漢」，並且是以「散落在民間的精神兄弟」作為後盾與支撐的；在我看來，民間思考可能存在着某種局限，但「它不以發表為目的的特色，又使其在思考的自由度與可能出現的深度方面顯示自己的優越性」。我因此而提出：「昨天與今天民間思想的礦藏恐怕都存在着有待挖掘的潛力，還會因某種機緣而對未來中國產生影響也說不定」。委婉的語氣裏是包含着某種巨大的期待的。

沒想到我的呼喚很快就得到了回應。經新結識的朋友賀雄飛先生的介紹，一本《一個隱者的殘稿》送到了我的手中，並且與作者見了面：果然是蒙古草原裏的一條漢子，豪飲，放言無忌，舉手投足之間散發着一股「氣」，讓人感到痛快。後來又從談話與通信中得知，此兄一生經歷坎坷：先是因家庭出身於五六十年代流落到塞外荒村教書，卻苦讀、苦抄、苦寫了五大紙箱的讀書筆記和書稿（這讓我聯想起自己六十年代在貴州教書時也是寫了大量的筆記與書稿），其中一本百萬字的《〈韓非子〉條析》是對作者所說的「中國極權專制主義的精神乳母」韓非的批判。文革中因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被強制勞動，服苦役達十年之久。1978年以後，曾在一些單位任職，終因思想的異端而不能相容，遂回到陰山腳下結廬隱居，仍筆耕不止，又寫下了《一個思想犯的殘稿》、《中國異端思想史》等五大箱文稿，本也無意發表，這回是在朋友們的再三逼迫下才整理出部分「殘稿」，但仍想隱姓埋名，就借用了《莊子》裏的隱者「徐無鬼」權作「筆名」。但這又是怎樣的一位「隱者」啊，如作者在〈人生諸苦〉一章中所說，「真隱是完全的隱、徹底的隱、身心皆隱，是佛隱，不僅在

他的穴口『把爪印抹掉』，而且在心靈深處抹掉了一切對人間的牽掛，進入無的境界」，這樣的真隱者大概也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為世人所知；而人們所談論的，多是「邦無道則隱」，「隱者的心還在人間，隱者時刻被民眾疾苦、天下風雨所打動」，「在隱居中仍為人類的靈魂而牽腸掛肚」，這種「假中有真」的隱者，自是魯迅所說的「以隱為『啖飯之道』」的「假而惡之隱」所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正因為遁居山林，不因俗事而分散注意力，專心致志地思慮人間苦惱，反而愈感痛苦。「徐無鬼」兄即是如此。他說有「三重憂痛（憂天，憂國，憂己）」與「三重孤獨（無侶，無友，無類）」在撕咬着自己已經流血過多的心，並時時感受着「三重悲觀」：既悲慨於宇宙時的萬劫，又悲憤於極權統治敗壞了一個民族的心，還悲涼於暮年已近，無所作為。我自認是能夠理解這種刻骨銘心的痛感的：我與他正是同代人（「徐兄」比我大三歲），有着精神大迷亂以後的清醒，對於精神的痛苦是格外敏感的。我讀「徐兄」的文字，總要想起魯迅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所說的「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而且是帶着血蒸氣的；記得當年在看王乾坤先生的論文時，也有過這樣的聯想，也是以此為題寫了一篇文章，大概世上是有一批人因此而結成了某種因緣的。我將「徐無鬼」視為「精神的兄長」，是理所當然的。

但也要坦白地承認：我讀「徐兄」的「殘稿」，感情反應是頗為複雜的：在幾乎每一個字都引起強烈的共鳴的同時，又處處以「徐兄」為鏡，反省着自己。就說一個細節吧。「徐兄」在書稿中多次提到那位蹲在牆腳曬太陽的西方哲學家，對前來求教的聲名顯赫的帝王喝道：「走開，不要遮住我的太陽」；他自己也是這麼

做的：一次，幾位當了官的昔日的朋友造訪，說是要來「聊聊哲學」，他讓妻子把他們的奧迪坐騎擋在柴扉之外，說正在與他人談話。秘書們問：「和什麼更加重要的人物談話不見我們？」答曰：「蘇格拉底。」這些人才默然而退。「徐兄」將這件事寫入了書稿，並且解釋說，這是為了「維護哲學的尊嚴」（豈可「輕談哲學」）與「思想的尊嚴」。本書開張明義，討論的就是「我思故我在」（笛卡爾）、「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帕斯卡爾）這兩句哲言。在「徐兄」看來，「如果人不思想，就變成一頭。除了在污濁中打滾然後任人宰割還有什麼尊嚴可言？」「一個無思想的富翁，一個無思想的國王，尊嚴何在？」「為思想而受苦受難，要比不思想無思想反思想而享福要高尚得多」。他據此提出了「平民的高貴」與「統治者的高貴」相對抗：後者炫耀於權勢與金錢，後者則睥睨之：「你享受權力的陶醉，我享受思想的樂趣；你貪戀黃金的光輝，我沉迷群哲的智慧；你有劍，我有筆，三寸毛錐折斷了多少帝王的長戟」。本來，傲視王侯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但經過幾十年的「思想改造」，我們雖號稱知識分子，卻早已失去了思想與知識的尊嚴感與平民、布衣的高貴氣質了。那些教授先生，甚至是最高學府的校長，在權勢者面前，或是搖尾乞憐，或是受寵若驚，這樣的斯文掃地的怪事、醜事，我們不是早就見怪不怪，見醜不醜了嗎？就連我自己，由於至今還沒有根本擺脫單位所有制所造成的人身依附關係，不是依然也還是小心謹慎，夾着尾巴過日子嗎？反觀隱居山林，處於體制之外的「徐兄」，昂着高貴的頭顱，完好地保留着心靈的尊嚴，想說就說，不想說就不說，想罵就罵，想哭就哭，這是何等地令人傾慕啊。

讀他的文字，我最強烈的感受到的，也是一種我所沒有的解放感與自由感。記得魯迅曾經說過，他的文章不僅要經過編輯與主編的層層除，首先自己寫作時就抽去了若干「骨頭」，這樣讀者就很難讀到有骨氣的文章了。時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們的文章比魯迅當年更難見「骨頭」，無論是外在的壓力與內在的所謂「自律」（自我束縛）都要嚴重得多。前者讓我憤懣而無奈，後者使我尤感窩囊與沮喪：我現在甚至是鍵盤還沒有敲下，就已經本能地想到哪一點可能犯忌而躊躇了。「徐兄」的寫作，因係「紙箱裏的文字」，大概就不必如此如履薄冰，瞻前顧後，這同樣令人羨慕。——當然，放在紙箱也有危險，「徐兄」文革中的遭遇就是證明，不過這些年比較少見，這大概也是一個「進步」(?)。而且這回「徐兄」把文章從紙箱拿出來，公之於眾，在「整理」過程中，不知是否也經過一番「處理」（一個多麼可怕的字眼）？但不管怎樣，「徐兄」的文章還是比我更無羈無忌。可以這麼說，作為「精神的兄弟」，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十分接近的，比如對思想自由與尊嚴的關注，對強權統治下人（國民）精神異化現象的剖析，對一切奴役（特別是精神奴役）的批判，等等。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做的是同一個工作：把所經歷的苦難轉化為精神的資源。但很多地方，我沒敢想下去，淺嘗輒止了，「徐兄」卻把它想透了；有的我開了一個頭，沒有寫盡，「徐兄」卻寫透了。因此，本書處處都可見犀利與透闢的分析，看似荒誕實則深刻的奇思異想，讓我拍案叫絕，讀者自會解讀領悟，不必多說。而我還要強調的是，「殘稿」字裏行間所透出的磅之氣，這是這些年的許多著作（也包括我的論著）中所少見的。這與思考、寫作時的精神狀態大概很有關係。我為此而感慨萬端，也不細說了。

而「殘稿」的某些思考更是我所沒有達到的。據「徐兄」說，他在回到草原以後，心境大變，夜夜仰望星空而追尋不到生命現象的終極，遂開始研究佛學。從佛學中他找到了作為「宇宙時」的「劫」，又從現代科學中找到了作為「宇宙尺」的「光年」，在「不可說劫的時間與不可說光年的空間」中，他深感「人類存在的渺小和孤獨」而心痛欲裂。——坦白地說，或許因為我這個人過於投入現世，竟缺乏這樣形而上的體驗，自然也說不出什麼，但「徐兄」的痛苦或許因此而更為深沉，並形成了他生命選擇的內在矛盾，即他在《殘稿》中所說，「他曾想學佛隱、大隱、身心俱隱，而且想學一種捨身之隱，破滅這個臭皮囊，到他所來的塵埃中去。但是他的妻子哭，孩子罵，朋友勸，（或許還有他自己的內在原因——錢注）使他失去了弘一那種斷袖而去的勇氣和決心，只好在山野築茅舍而居，修煉半隱」。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徘徊人間，時隱時現，作痛苦的偷生，一邊流淚，一邊整理殘稿」的「徐兄」：正因為徘徊，充滿矛盾，這才是更為真實的。

不管怎樣，這部「隱者的殘稿」還是面世了，自然有一個「他者」的評價問題。我不想掩飾自己對這本書的偏愛，甚至可以「預言」，它會引起有着類似生活經驗與生命體驗的同代人的共鳴。至於比我們年輕、有着不同的經驗與體驗的讀者會如何反應，則沒有把握。或許他們也能從中受到某些啓示，或許會提出不同的意見與批評。我、「徐兄」在內的這一代人的思考，包括我們對自己所經歷的這一段歷史的反思，當然是有局限的，而且會隨着時間的推移，看得越來越清楚。但我仍然有着兩點基本的自信：我們的反思是真誠而且嚴肅的；我們這樣的歷史當事人的反思，

是其他時代的人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所不能替代的，它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基礎：它的有生命力的成果將為新的研究提供了思想的資源，它的失誤、偏頗也會成為新的研究的突破口。——當然，這都是「後話」，現在也不必想這麼多。對於我來說，讀這本用生命寫出的書，又結識了一位可以以心相交的朋友，這也是人生（特別是進入了老年以後）的一大快事。「徐兄」已經約我作塞上游，「騎馬射雕，觀大漠孤烟；把酒論文，看箱底殘稿」，這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我們這輩人，歷經磨難，也該縱情一樂了。

第二章

正是這真實令人戰慄

蔡玉鑲《突圍》——一個底層知識者的人生體驗》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寫於病中

(一)

儘管我一再地表示想要擺脫身外與身內的沉重，但依然如山般的壓來——這又是一部讓我無法平靜地對待的書稿。

書寫得並不漂亮，但卻十分的真實——正是這真實令人戰慄。

單是這篇〈矮子家族史〉裏的這一聲長嚎：「矮子，苦哇」，就足以催人淚下。有誰會想到，身材的矮小與其貌不揚，竟給人帶來了如許的屈辱；僅僅是要與別人平起平坐，活得有頭有臉，竟要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代價！又有誰會關注，這「矮小」的身軀承受着多少精神的與肉體的苦難，蘊藏着怎樣一個巨大而複雜、豐富的精神世界：那異乎尋常的自卑與自傲，與身體的矮小形成巨大反差的內在的志氣、英雄氣、風雲氣、大丈夫氣，那越是受壓受挫而越加強烈的內心的不平，焦灼，憤激，狂躁……，水裏浸泡過千百次、烈火裏熔煉過千百次、污血裏爬滾過千百次仍然不屈不撓的鋼筋鐵骨般的頑強的生命力，那拼將青春拋擲，不惜血肉濺飛，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捨命掙扎，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一代人倒下，下一代接着衝上去前仆後繼的奮鬥……，這都構成了一部歷史：作者個人的血淚史，蔡氏家族的血淚史。而且我要說，這一切，包括「矮子」的意象，都具有一種象徵性：難道你不會由此而聯想起我們的國家、民族？作者說，他發現本世紀曾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深刻影響的孫中山、魯迅，以及鄧小平，都是矮子；這事實或許有某種偶然性，但把它視為一種象徵，也是可以的。自從上一個世紀中葉，中國的國門被迫打開以後，在與

世界各國的比較中，中國人突然發現了自身的「矮小」（落後），由此而開始了一個多世紀的屈辱史，掙扎史，奮鬥史。於是，本書作者和他的矮子家族所顯示的前述精神特徵，固然帶有明顯的個人性與家族性，但卻具有更普遍的典型性，這是一個本世紀的典型精神現象，它是能夠讓人們聯想起我們這個民族百年奮鬥中豐富而複雜的心理內容的。

但我最想強調的卻是本書的另一種典型性：「矮子」是可以視為「受屈辱、被損害者」的代名詞的。作者把他的這部血淚之作稱為「一個底層知識者的人生體驗」，是大有深意的。作者一刻也沒有忘記，他的祖輩、父輩都是農民；即使他已經脫離了土地，成為一個知識者，但依然沒有忘卻、也不可能擺脫自己與生俱來的「底層」性。於是，他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儘管正是農民及底層人民養育了中國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他們為這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付出最多，犧牲最大，但卻因為貧窮，因為沒有文化，而長期被人「矮視」，受盡屈辱，而且前述民族的屈辱主要是由中國的底層人民承擔的，可以說，他們是將民族的、階級的屈辱集於一身的。這正是構成了本書作者這樣的「底層知識者」最根本的生存體驗，他（他們）對「矮子」的處境的特殊敏感，格外深切的痛苦，其實是包孕着這更為深廣的歷史內涵的。

因此，儘管如魯迅所說，這還不是沉默的國民自己發出的聲音，但這些底層知識者的掙扎與呻吟，是應該傾聽與關注的。而這恰恰是當今中國被壓抑了的聲音。我在剛寫完的一篇文章裏寫道，在這世紀之末，聽見的是在一片狂歡之聲，早已將弱者的哀哭掩

埋。知識精英依然高談闊論，但中國的「矮子」們，這些備受歧視，備受凌辱的人們的真實的痛苦，卻不在論題、視野之內，君子遠離庖，大家相安無事，大概就要在太平聲中迎來新的世紀吧。

那麼，這執拗如怨鬼的一聲聲「矮子，苦哇」，實在是有点掃興。不知道願意傾聽的人，還有沒有？

(二)

本書最動情的篇章都是獻給奶奶，母親，父親，哥哥與妹妹，獻給自己的家族的。這是作者和中國的底層知識者的「生命之根」。

於是，我們聽見了：「一字一頓，幾乎是從喉嚨管裏扯出來的，奶奶咳着，喘着，用整個生命唱出的」歌謠——

天——公——公——喂
地娘——娘——喂
保護——我家小——毛
升——學——堂——喔

作者告訴我們：「當天夜裏，奶奶便離我而去了。……這是奶奶留給我的最後一支搖籃曲，我流着淚，默默地唱着哭着重複着，

於是它變成了一首古老纏綿悲涼淒慘和深刻沉重的安魂之曲，在我的耳邊永遠回蕩……」（《搖籃曲》）。

大概每一個來自底層的知識者都有過類似的體驗：他們的耳邊永遠響徹着這古老的生命呼喚。

這古老的聲音是來自中國農民的心靈深處的：他們幾乎一字不識，深信自己的一切不幸都與此有關；於是，知識、文化、學堂，在他們的心目中，具有一種神聖性，他們是如此虔誠地祈禱着上蒼，讓他們的子孫後代，能夠念書識字，有着另一種命運，這是整個家族希望之所在。讓孩子上學，有個「出息」，光宗耀祖，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農村吃苦耐勞的父母生命存在的全部價值。對於作者這樣的「矮子家族」，讀書就更具特殊的意義。這是奶奶臨終前的囑咐：「孫子都矮，不考學堂就要投人家降」；這是父親的信念：「人矮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矮又沒有本事」；於是形成了兒子的理論：「矮子的強大靠的是精神，矮子必須從智慧方面發展」。這可以說是物質貧困、苦難深重的中國農民，以至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從自身的經驗中提升出來的生存哲學，這是絕境中的希望之光：讀書，追求精神的豐富，成了「矮子家族」的唯一生機。因此，當讀者看到作者的父親怎樣逼孩子念書，扯耳，碰壁，踢腿，罰跪……，是不能不受到震動的：在這幾乎是不近人情的殘酷背後，隱藏着的是怎樣巨大的期待與愛！中國的農民的孩子是懂得這一點的，他們不會埋怨自己的父輩，只會把這一切深埋起來，成為刻骨銘心的原始記憶，化

作最基本的生命欲求：無論如何艱難，也要讀好書，報答父母，為「矮子家族」爭口氣！作者說，奶奶歌謠裏的期待是他生命的「安魂曲」，這是實在的：不讀得個「出息」，這些農民矮子的子孫的靈魂是永遠也不得安寧的！

這樣，中國農民、大地母親哺育了自己的兒女，又把他（她）們送出了土地，並且期待再也不要回來。

(三)

本書的作者和他的同輩，於是在父輩的囑望中，走上了永遠的不歸路。

這歷史的選擇發生在八十年代的中國。

那是一個激情澎湃，充滿理想的年頭，是一個做夢的時代。在作者的筆下，成了永遠懷想的「那個時候……」：「那個時候，散了多少步啊，那個時候說了多少話啊，那個時候寫了多少信啊，那個時候吹了多少牛啊……」，「那些放言肆膽謬談闊論的日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啊！（《今夕何夕——致洪波書》）於是作者做起了「文學夢」，一個玫瑰色的夢。作者在九十年代回憶說：「本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青年中做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文學夢」，「那時候的風氣是不愛作官愛文學，不像現在文學很臭，每一個人

摸到自己的肚臍眼都是錢」(《大哥的文學夢》)。他說的完全是事實，儘管在今天的青年看來，這更像是一個「現代神話」。正是文學把這個「矮子家族」裏後代內在的英雄氣、丈夫氣全部誘發出來，使他堅信：通過文學的天梯定能使自己由軀體的「矮子」變成精神的「巨人」。整個家族也這樣期待着他：「我家的玉鑲佬將來在文學上大有前途」！在那個「文學是崇高的事業，每一個有可能成為作家的文學青年都被捧為天上的星座」的時代，這無異於宣布，他將從根本上振興蔡氏矮子家族！——這志氣，這責任，這預言，這自信，以後就成為一個掙不脫的夢魘，永遠追懾着他，壓迫着他的靈魂。

本書的作者就這樣在八十年代的夢幻中，從一個農民的兒子蛻變成一個充滿浪漫氣質的知識者。

他在中國中部的一個小城裏安身下來。——終於脫離了土地，卻又開始了新的生命的苦難歷程。

無論如何，總算成了「公家人」，這應該是有了「出息」，家族的夢想至少是部分地實現了。

但他不能，他仍不得安寧。

他陷入了中國小城鎮的灰色生活的塵埃之中。這就是本書「生存之累」中所描述的那些「有聊」的與「無聊」的日子，「教書，回